

从史前玉器解读中华文明起源信息

王潇慧

摘 要 考古发掘获得的遗迹、遗物是探索文明起源信息的第一手材料。史前玉器的发现与研究,是探求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史前玉器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文化中极为发达,传达出了重要的社会信息。本文拟以史前玉器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史前玉器的制作技术、文化与社会背景等方面的研究,探讨史前玉器所表现出的文明因素,分析史前玉器所传达出的史前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信息。

关键词 史前玉器 文明起源 信息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连续发展没有中断的文明体系,也是起源和形成时期最早的文明体系之一。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玉文化是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发达的史前玉器不仅是中华民族宝贵的遗产,也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一条重要线索。

一、从史前玉器看生产水平

玉器的制作涉及采玉、剖玉、钻孔、镶嵌、抛光等方面。距今8000年的查海——兴隆洼文化中发现了年代最早的玉器,先民在长期制作、使用石器的实践中,逐渐地认识了属于山川精英的玉器。“玉不琢,不成器。”玉器与石器的制作技术的本质区别在于琢磨技术。从近现代地理学和矿物学关于各地出产玉石的研究成果中可知,各考古学文化采玉主要是就地取材。虽然当今对于史前玉器的制作是否使用了砣机尚存在争议,但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痕迹中,可以发现切割、钻孔、抛光等技术的运用。有的已十分发达,例如管钻即有锥钻、桎钻等。红山文化的玉勾云形器、玉马蹄形器的制作凹痕,良渚文化玉琮、玉梳背所刻神人兽面纹的精细雕刻,都是制玉工艺发达的产物。各文化相比较来看,工艺仍然有所差别。例如,红山文化玉器的抛光工艺是初步的,良渚文化玉器的抛光工艺则较红山文化玉器有较大进步。

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工艺已形成定制与规范,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各种工艺手段已臻完备。“新石器时代玉器具有明显的早熟特质”,“中国人的民族启蒙一开始就摆出一副老成持重的姿态”。

二、从史前玉器看礼制萌芽

礼制是中华文明特有的,也是重要的内容。史前玉器所承载的宗教祭祀功能,是中华文明礼制的萌芽。中华礼制中最核心的内容有三点:一是祭祀天地,二是祭祀祖先,三是尊崇王权。史前玉器所体现的宗教功能是随着人们宗教意识的变化而变化的。远古时代宗教的演变经历了从以巫文化为核心的原始宗教向以祭祀崇拜为特征的理性化宗教发展的过程。原始宗教是一种以“万物有灵”的多神观念为指导,“家为巫史”,人人为巫,利用控制性巫术性行为达到避邪免灾、控制大自然神秘力量的宗教模式。其以崇拜行为为核心的宗教形式包括祖先崇拜、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等。而理性化宗教中的巫术行为逐渐淡化,信仰“一神

教”,以祭祀文化为核心,产生了专门的祭祀阶层和神职人员。

先于良渚文化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及崧泽文化中,玉器作为死者生前佩戴物随葬,具有安抚灵魂和避邪的功能,是原始宗教中相信万物有灵,自然具有神秘力量作用下的产物。虽然这些文化中的玉器其本身的功能局限于装饰、佩戴作用,然而作为整个随葬仪式中的一部分,便被赋予了强烈的巫术功能。

而良渚文化中的玉戚、玉琮、玉璧、玉璜等已不再是装饰佩戴之物,具有特殊的、专门的礼器功能。一定数量、种类不同的玉器以“玉敛葬”的形式确定了它们相互间的并列或从属关系,并共同形成了某种“信仰——行为”统一体,那些聚集在不同玉器周围的信仰、仪式规则,构成了良渚文化时期以玉为核心的宗教系统。从它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大型墓葬,加之瑶山祭坛、红山文化女神庙等建筑的出现,充分说明已经出现了由特定的、掌握祭祀权力及祭祀工具的贵族或巫觋,在特定的场所,举行大规模的、多家族的共同的祭祀活动。这一活动不仅将这些掌有祭祀权力的贵族或巫觋列入被众人尊敬、崇拜的地位,同时掌有这些权力的贵族或巫觋也通过手中的权力对整个群体进行指挥与掌控,这是当时社会运转的机制,也是三代祭祀制度与政治制度互为一体的萌生基础。

三、从史前玉器看社会分化

1. 社会分工出现。

仍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例,两文化均以随葬玉器为显著特征,并且尤以祭坛、墓葬集中,呈现出玉殓葬现象,红山文化甚至有随葬品全部为玉器的现象。而诸如玉玦、玉环、玉坠、玉珠等小件玉器在分布上是比较均匀的,而玉戚、玉琮、玉璧等则分布较为集中,被认为是专门从事占卜、祭祀的巫觋所占有。这一现象表明,巫觋的出现是从“家为巫史、人人作巫”中的宗教活动中分离出来的专门从事巫术、祭祀的职务的阶层。此其一。

其二,玉器的产生,需要在社会生产的发展上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而玉礼器器型复杂多样,且规范性较强,纹饰繁缛细密,要求有较高的开料、琢器的技艺水平,若以横向对比当时已出现的制陶、编织等手工业技艺,可以发现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加之玉礼器所承载的重要礼仪功能,它的制作也必然要求有一批专门为之生产的手工业者。

2. 社会等级出现。

根据考古发掘报告中墓葬规格、玉器数量的分析,可以发现,良渚文化中出土的玉璧、玉琮基本来自良渚文化大型墓葬中,而于小墓则罕有发

(下转第25页)

坚决的抵抗。2月2日,十九路军全体官兵通电誓死抗战,呼吁全国军民激发良心,人自为战,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开始了淞沪抗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的日本工厂工人举行抗日同盟总罢工,各界人民纷纷组织反日救国会,纷纷参加抗日义勇军、运输队、救护队等,积极支援前线,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战。淞沪抗战在上海军民的英勇斗争下,坚持了一个多月,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日军死伤1万余人,四度更换司令。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在其他帝国主义的调停下,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一二八事变后,因十九路军在上海的坚持抗战,违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借此进一步削弱十九路军的实力和打击共产党的力量。该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开始不满于蒋介石,进行了反蒋活动。蔡廷锴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时,在《挺进》报中写到:“去年纪念‘九一八’,还只悲痛东三省的丧失,今年纪念,又加上了热河一省的沦亡。世界上占大多数人口和占最广大疆土的国家,竟被一个小小的岛国迭次的侮辱。”^[7]1933年9月,蔡廷锴派陈公培通过延平前线会见了红军东方军负责人彭德怀等人,双方实现了休战,后又与中共苏区谈判,双方签订了《抗日反蒋初步协定》,实现停战互助,中共苏区派了潘汉年、张云逸作为红军代表入驻福州,以加强双方的联系。1933年11月20日至22日,福建事变爆发,十九路军在福州召集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会上宣布建立中华共和国,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推选了李济深任政府主席。21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通电退出国民党,宣布独立,并发布宣言:“要救国,我们必须推翻南京政府,它在十九路军抗击日本侵略时不去支持它,它已经出卖了热河和华北,并阻止所有地方军队增援华北的军队。”^[8]福建事变的爆发有力地延缓了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对亲日派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促使蒋介石的对日政策有所改变。

4.桂系的两广事变的推动。1936年,新桂系首领李宗仁发表了“焦土抗战论”,攻击蒋介石中央当时的“不作为”。随后,李宗仁、白崇禧多次发表文章,攻击蒋介石中央对抗日之不作为,并声称地方实力派愿共同出兵抗日。与此同时,新桂系暗中与共产党相呼应,以抗日之名义攻击蒋介石。同时建立了同新桂系之政治盟友——广东陈济棠的联系。

1936年5月26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6月1日,又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呈文国民党中央,要求抗日。22日,两广又组织军事委员会,陈济棠、李宗仁分任正副委员长。两广方面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手段,打出了请命抗日的旗号,旨在制止蒋介石采取军事行动,桂系同蒋介石的矛盾激化。7月15日,国民政府通电全国,宣布将李宗仁、白崇禧外调,明升暗降,但同时又委任原属新桂系、但早在中原大战便已经投蒋的黄绍竑主政广西,企图分化新桂系。李、白二人拒不到职,而黄绍竑暗通桂系,居然公开表示不愿就职,两广事变陷入僵局。7月底,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慨和对新桂系的同情,全国各界和各地方实力派开始倾向于新桂系。9月4日,国民政府和军委会发布命令,李、白二人和桂系大小官员之职位不变,新桂系官员则隆重在南宁就职,宣布服从蒋之中央,至此,两广事变解决。两广事变在历经3个多月,双方出动多达80万部队对峙后,最终不发一枪一弹而告结束。两广事变是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进一步加深而引发的,进一步推动了国民政府的抗日步伐。

综上所述,各地方实力派的努力和斗争为第二次国共合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尽管他们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中的立场不尽相同,但对打击日本的入侵、争取全民族的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关于停战抗日之谈话.文献和研究,1985,(4).
- [2]国民党提出的谈判条件.文献和研究,1985,(4).
- [3]解放日报,1936-12-13.
- [4]东望(第六卷第六期),陆军第六十七军参谋处刊行,1936.陕西档案馆藏.
- [5][6][7][8](美)柯博文著,马俊亚译.走向“最后关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3,123~124,134,134.

王武志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硕士研究生
(责编 高生记)

(上接第5页) 现。因此可以肯定,拥有大批琮、璧玉器的墓主,生前也一定掌握着祭祀天地、沟通人神的权力。玉琮、玉璧不但是沟通天地的神器,更是宗教仪式中重要的礼器,因此,对琮、璧的占有事实上即构成了对事神权力的独占和对宗教职能的垄断。而多数的小墓主人在生前是没有这一权力的。权力被社会的上层所垄断,这些权贵通过垄断宗教事神权,进一步巩固其在社会上的地位。可见,这一时期已经十分清楚地分化成了贵族与平民两个等级。

史前玉器的产生及玉器功能的演变,是当时社会物质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玉为媒介的宗教祭祀活动,促进了社会领域的职能分工,创制了政治领域的组织模式,带动了精神领域的礼仪统一,形成了围绕玉器而建立的祭祀礼仪制度,是文明时代礼仪制度的先声,是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构成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切因素都是围绕着权力垄断、宗

法礼仪制度的形成这一核心发挥作用的。当把考察的重点放到史前玉器的功能演变上时,可以清晰地看出史前玉器所传达出的文明信息。

参考文献:

- [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 [2]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1995,(5).
- [3]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1).
- [4]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东南文化,1988,(5).
- [5]尤仁德.古代玉器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王潇慧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硕士研究生
(责编 高生记)